

1201.25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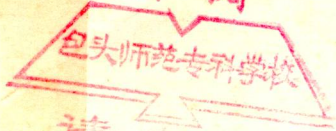
0000312



红楼梦专题资料汇编

中文系编
包头师范学院图书馆

赠阅



请交换

I201.25
26.5

I210.25

711

7470122
1000312

红楼梦专题资料汇编

内部教学参考材料



包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编

一九七四年

《红楼梦》专题资料汇编

目 次

第一编

- 一、毛主席指示…………… (1)
- 二、鲁迅论《红楼梦》…………… (6)

第二编

- 一、李希凡《〈红楼梦〉前言》…………… (12)
- 二、《红楼梦》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57)

第三编

- 一、何其芳《论〈红楼梦〉》(节要)——代序
…………… (70)
- 二、何其芳《论〈红楼梦〉》一书的论点摘录
…………… (108)
- 三、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一书的论点摘录…………… (113)

第四编

- 一、“旧红学”的唯心主义谬论摘录…………… (118)
- 二、“新红学”的唯心主义谬论摘录…………… (120)
- 三、刘少奇、周扬一伙有关《红楼梦》问题的
修正主义谬论摘录…………… (148)

编后说明

《红楼梦》专题资料汇编

第一编

一、毛主席指示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2页）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

记这个基本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24—625页）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東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655—656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

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见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7页）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

集》第三卷第827页)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9页）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668页）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8页）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6页）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

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二、鲁迅论《红楼梦》

原编者（《文汇报》革委会办公室）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当“旧红学”索隐派和“新红学”考证派正在那里把《红楼梦》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伟大的鲁迅却在一些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中，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运用《红楼梦》里的一些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跟“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和“新月社诸君子”，以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超时代”、“超阶级”的文艺观等种种反动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些评论中，鲁迅对曹雪芹和高鹗思想的比较，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价值的评析，都提出了许多言简意赅、精当卓越的见解；他对许多狗尾续貂的续书和“旧红学”、“新红学”的种种谬说，对《红楼梦》阅读中的错误倾向，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几十年前就写出了这样具有鲜明的

阶级观点，富有革命性战斗性的评论，这是十分可贵的。现将鲁迅关于《红楼梦》的部分论述摘编如下。

文学不惜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64。这里引用的是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十卷本《鲁迅全集》，下同此。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第五卷页430。

……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霭，《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霭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第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人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此句是柳湘莲的骂语，见第六十六回。焦大醉骂宁国府，见第七回。）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第五卷页94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集外集·〈绛洞花主〉小引》，第七卷页419。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

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弔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八卷页349—350。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八卷页350。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卷页195。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

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第五卷页429。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卷页195。

其（指高鹗）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卷页199。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蓬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r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坟·论睁了眼看》，第一卷页330。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

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第四卷页228。

……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八卷 页350。

第二编

一、李希凡：《红楼梦》前言

我国古典小说的著名作品《红楼梦》，最初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清代乾隆王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传抄、流传，到了十八世纪末，才有高鹗、程伟元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刊行问世。这时距离曹雪芹逝世不过三十年左右，《红楼梦》已风靡全国。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间，曾经盛传过这样的谚语：“开谈不讲《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这说明了这部小说在清代中叶之后，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近古文学史上，《红楼梦》一向是学者文人们注目的中心，所谓“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这情形从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大体上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百多年间，是穿凿附会的“索隐派红学”占主流地位。他们大搞“索隐”、“抉微”，拚命想从这部小说中寻求所谓“微言大义”，“抉”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破裂，又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新红学派”。他们假借研究《红楼梦》的名义，大肆推销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们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行反对革命、毒害青年之实。

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为了反

对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狂热鼓吹什么“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以及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的伪“科学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他的《红楼梦考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胡适根据他这种“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进行“小心的求证”，在他的《红楼梦考证》里，分析研究《红楼梦》的结果，得出了这样几条结论：

（一）《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二）《红楼梦》“全书的‘旨义’”是“闺友闺情”，“红楼梦十二支曲”、“风月宝鉴”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处。

（三）《红楼梦》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胡适在这里妄图用这种“自传”说完全抹杀《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内容，取消这部小说的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历史价值，否定它的艺术典型的概括意义。

然而，实用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反动本质的，因为胡适的这种孤立的、狭隘的、离开社会实践的研究方法，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真面目。

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辨》里，对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考证学亦步亦趋。据俞平伯自己讲，在胡适提出这些主张以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

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以后，“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才感染到我”。从此，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一唱一和地讨论《红楼梦》，以实践他们的主张了。俞平伯一会儿说，《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一会儿又宣称：“《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它的“基本观念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甚至从所谓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的形式主义考证出发，推断出薛宝钗、林黛玉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实为一人”，即作者的“意中人”。他把胡适所考证出来的结论加以扩充吹涨，本末倒置地把小说《红楼梦》的内容变成事实考据的对象，又把史实上的曹家和小说中的贾家互相比附，使《红楼梦》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被割裂成从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的偶然的事实碎片，妄图用这种不可知论“自传说”，把文学青年引进烦琐考证的迷魂阵里去，以便于“无形中，养成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用主义的信徒。

“新红学派”特别是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假借“整理国故”研究古典小说，大肆贩卖这一套反动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胡适曾毫不掩饰地声明：“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我是“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并恶毒地叫嚣：“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因而，他们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狂热鼓吹：“京事一切沉闷，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其毒害青年、涣散斗志的罪恶用心，是昭然若